

圖象；第六章是關於鳳凰村的家庭，並對家庭的類型和影響家庭運行機制的動態的「分家」進行了討論；第七章，是對於鳳凰村的宗族制度的分析，特別是對於祖先崇拜和宗族之間的有機聯繫包括改革以來宗族的復興和創造，結合葛學溥的調查，做了梳理；第八章是關於鳳凰村的「輪火頭」與老人贍養之間的關係，對於「輪火頭」制度在現階段中國社會中的合理性作了分析。這五章加一節都是以婚姻、家庭、宗族等為主綫展開的。而第九章的鳳凰村的信仰與習俗、第十二章的鳳凰村與周圍村落的關係和鳳凰村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的社會結構與儀式、信仰以及村落組織之間的有機聯繫。第三章的鳳凰村的經濟生活、與第十章的鳳凰村的文化教育和第十三章的鳳凰村未來變遷的方向，主要從經濟和文化教育的視角，給我們展示出鳳凰村的過去的經濟生活和未來的變遷方向。最後，作者對於鳳凰村的變遷的原因，從變遷的外部因素、村落社區的內在因素以及傳統的復興與現代化的角度，做了有關這一村落過去和現在的變遷軌跡的學術探索。

作者在對葛學溥的學術評價中，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如葛學溥的家族主義的概念、家族的分類、鄰里與「社區」的概念等等，這些概念並非完全出自西方學術系譜中，而是研究中國社會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從中看到，即使在最早的漢族社會的研究中，葛學溥已經注意到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問題，即在中國研究中如何把民俗概念上升為分析概念，同時也是我們中國人類學面臨的問題，其實葛學溥早已經做出了榜樣。而周大鳴的研究，正是在這一榜樣的感召下，讓我們認識了八十餘年來華南農村和農民的變化軌跡。

麻國慶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唐力行等著，《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367頁。

《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是近年來區域史比較研究的一部力作。

唐力行長期致力於區域社會、經濟與文化史研究，率先將包括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引入區域史研究，在區域社會史研究領域享有盛譽。20世紀80—90年代，他先是進行徽州的區域研究，並從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等基礎

工作做起，對明清以降徽州的社會與經濟進行系統的探索。在對徽州和包括蘇州在內的江南兩個典型區域研究的過程中，唐力行逐漸以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為中心，力戒以往研究中「宏大敘事」和精英歷史研究的不足，開始自覺地在研究中把整體中國史與區域社會史研究相結合、長時段分析和短時段探索相結合、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研究相結合，同時注意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創新，並相繼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

本書是作為200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重大項目和上海市重點學科項目，由唐力行帶領一批年輕的研究人員，在徽州與蘇州研究的豐碩成果與豐富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完成的成果。這部以16—20世紀為中心，旨在探討和研究蘇州與徽州這兩個既互相獨立、又彼此聯繫的典型區域互動與社會變遷的學術專著，是唐力行一再倡導的區域與區域之間比較研究的成功嘗試。

該書由序言、緒論和蘇州與徽州專題比較共九章，11部份組成。

在「序言」中，著者從中國傳統史學研究中的不足，談到社會史研究的總體發展趨勢，認為「社會史就是全面的歷史」（頁1）。並指出：「社會史包括傳統史學的研究對象，但比傳統史學的研究範圍廣泛得多，它包括全面的時間、全面的空間和全面的人。這也是社會史研究的三要素。」（頁2）接着，著者從社會史研究說開去，以為全面的時間其實包含着布羅代爾所言的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體時間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都是與區域研究相關的。因此，著者認為：「區域史不僅代表了20世紀以來史學研究的大趨勢，而且是將中國史學的傳統與新史學的研究理路相糅合，輔以跨學科方法，從而推動關注全面的、整體的社會史研究進一步深入的必由路徑。」（頁3）區域史研究的價值並不在於區域史研究的本身，而在於區域史研究「深化中國整體史的研究」。這些見解應當說是極富真知灼見的。由此，我們深切地感到，區域史研究其實也是一種方法論。

但區域史研究自身存在局限性。在區域研究過程中，唐力行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我們不能把研究的眼光僅僅局限在區域本身的範圍內。區域的存在與發展不是孤立的，必定是在與相關區域的經濟、文化互動中進行的。同時，區域經濟文化的特徵與變遷規律，只有在區域比較中才能突現出來。」（頁7）

正因為如此，著者才進一步把視野投向區域的比較研究，並在歷時性的前提下，努力尋找區域社會發展的「類型」進行比較。接着，著者從區域與環境的互動、區域與國家的縱向互動以及區域與區域的互動等四個互動關係

入手，對16—20世紀蘇州與徽州兩個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了高度概括性的比較。

在〈緒論〉一章中，著者順着〈序言〉揭示的「從區域互動的視野出發，將區域比較劃分為區域與區域間溝通、相互作用、知覺三個層面」（頁10）的理論路徑出發，對蘇州與徽州的歷史淵源、區位差異，16世紀以來蘇州與徽州間的溝通、相互作用和認知，蘇州、徽州的互動與江南社會變遷等三個方面，全面論述了16—20世紀蘇州與徽州之間的互動和社會變遷等深層次問題，並得出結論，認為：「區域比較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因為兩塊相互聯繫的區域，即使處在同一經濟文化發達地帶，由於自身內在的經濟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和行為取向的不同，它們的社會發展路向會有很大的差異。蘇州與徽州的互動，江南山地、平原與海洋的互動造成了江南的繁榮。區域社會正是在互動中發生變遷的。」（頁48）

該書第一章分別從兩地家庭—宗族結構的傳衍、差異和變異三個方面的視角，對蘇州與徽州的_一宗族結構進行了深入的比較。認為，「受人文地理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蘇州與徽州的_一宗族結構有共同之處，也有差異。……明清以來，蘇州與徽州都存在小家庭—大宗族的結構，但蘇州的小家庭—大宗族結構覆蓋十分有限，主要還是獨立的小家庭結構，而徽州的小家庭—大宗族結構是區域社會的主體結構。」（頁49）

第二章是對蘇州與徽州兩地之間家族遷徙與互動的比較研究。著者以歙縣望族大阜潘氏宗族因經商於明末清初由徽州遷往蘇州的個案為中心，系統剖析和全面考察了潘氏宗族入蘇的土著化過程、潘氏家風對徽州文化的傳承、潘氏入蘇後的家風衍變和蘇徽兩地間潘氏家族的互動等問題。這種以典型個案分析為中心，探討蘇州和徽州間家族遷徙與互動的比較研究，在方法論上顯然是值得提倡的，它有利於深化對問題的全面認識。

第三章是關於蘇州和徽州婦女的專題比較。著者從婦女這一獨特的社會角色分析出發，選擇蘇徽兩地婦女與經濟生活、兩地婦女與區域文化和兩地婦女共同命運的命題，對蘇州和徽州兩地的婦女與經濟、文化生活以及共同命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其中既有差異，也有相同。著者認為：「江南經濟、文化中心的蘇州與山區的徽州的婦女都是深受儒家倫理道德之害的，她們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這又是與兩地的社會結構緊密相關的。」（頁170-171）這實際上就是「大歷史」背景下的區域「小傳統」所致。

第四章是對蘇州與徽州的基層社會控制方式所進行的比較。著者以蘇徽

兩地自然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為背景，從蘇徽兩地宗族組織與宗族意識的差異，徽州宗族組織對基層民眾的控制，蘇徽兩地宗族組織、鄉紳與其他基層組織之間的關係分析入手，得出了蘇州與徽州兩地宗族意識和社會控制體系存在明顯差異的結論，以扎實史料和兩地不同背景為依據，這種分析和研究及其所得出的結論是很有說服力的。

第五章圍繞蘇州與徽州的社會保障比較為中心展開。著者通過對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分析認為，蘇州的社會保障體系與功能呈多元化特徵，而徽州則是一元化宗族保障系統，宗族保障與社區保障相互交叉，徽商傾力於徽州社會保障的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相應的社會聲望和社會影響力。著者還進一步探討了蘇州和徽州社會保障體系之間的差異與互動關係。其觀點和結論富有啟發性。

第六章是關於蘇州和徽州的市鎮之間的比較。就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而言，蘇州和徽州的市鎮之間布局、密度、穩定性和規模等形態差異明顯，其功能自然也不相同，兩地的市鎮結構也呈現諸多的不同，但這些並不影響兩地之間市鎮的互動。應當說，蘇州市鎮研究成果較多，而關於徽州市鎮的研究成果則是鳳毛麟角，至於將蘇徽兩地市鎮進行比較者，該著作應當是第一次，其學術價值十分顯著。

第七章和第八章，著者着重從蘇州和徽州的民間信仰與風尚習俗的角度進行比較。與前幾章相同的是，著者在進行比較時，時時緊扣蘇徽兩地的地理人文環境，以凸現兩地「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一傳統風俗與信仰上的差異。

著作的最後一章即第九章重點闡述蘇州與徽州進士文化素質與文化互動之間的關係。著者主要通過蘇徽進士群體數量在兩地人口中的比例、兩地進士群體在科舉中的名次和兩地進士所著詩文集情況的比較分析，並根據對明清蘇州和徽州進士之間的互動與文化素質關係的考察，揭示其運行發展的軌跡和特徵。

總之，16—20世紀蘇州與徽州兩地之間的互動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且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之中。正如著者所說的那樣，這種互動「滲透到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進入社會文化、大眾心態的核心層面。由溝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認知，這是一個循環往復而逐漸提升的過程。正是這一歷史過程中，使這兩個江南小區域不斷走向繁榮，同時又保持了各自的社會發展路向，從而使江南社會呈現多元的格局。蘇州與徽州的互動雖然使蘇州與徽州16世紀以來走上了不同的歷史路向，但它們的互動，卻共同造成了江南區域

社會的繁榮。」（頁11）

區域之間的比較研究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方法和手段。唐力行等撰著的《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正是這種跨區域比較方法和手段的一個成功嘗試。我們有理由相信，隨着這種相互關聯的區域之間比較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發展，一部多姿多彩的中國「整體史」不久將呈現在世人面前。

卞利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